

# 莺语江南,于精微处寻大美

◆ 汤哲明 肖永军

## ——鲍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审美与实践

在海派艺术蓬勃发展的当下,上海美术界涌现出一批兼具传统底蕴与创新精神的艺术家,鲍莺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。她的中国画作品扎根传统笔墨,又饱含当代审美意趣,以细腻绚烂的画面、朦胧浪漫的意境,在画坛开辟出一方独具诗意的天地。有人评价她的艺术“在守住中国画底线的基础上,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西对话”。在坚守传统之外,鲍莺更以近二十年的持续探索,构建起独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体系,成为海派中国画“守正创新”的生动注脚。

鲍莺的艺术之路,始终脚踏实地、循序渐进。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启蒙,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深造,再到上海中国画院的潜心创作,每一段经历都成为她艺术蜕变的基石。上海工艺美术注重中西并举,既夯实国画笔墨、设色、构图功底,也融入西画造型、光影训练,让鲍莺早早具备了融通中西的视野。进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后,她系统研习创作技法,深入领会传统文人画精神内核;上海中国画院浓厚的艺术氛围,则让她近距离接触名家,汲取前辈智慧,开阔艺术视野。

2006年,作品《故乡的路》让鲍莺在画坛崭露头角,也标志着其个人绘画面貌正式确立。这幅作品跳出传统山水画的宏大叙事,聚焦乡间归途的一隅景致:驻足的少女、斑驳的道路、摇曳的野花与张望的家犬,交织成一段温柔的故乡记忆。画面以细腻笔触传递真挚情感,令观者产生心灵共鸣。此后近二十年间,鲍莺的创作从清透朦胧,走向写意之境,艺术思想愈发成熟,风格也独树一帜。

中西融合,是中国画坛探索不止的重要课题。近代以来,无数艺术家试图在传统笔墨与西方语言间寻找平衡,或以西润中,或借古开今,却常陷人生搬硬套的窠臼。而鲍莺的智慧,在于她从未将“中西结合”当作口号,而是将其内化为创作的每一个环节。她深知,艺术语言可以借鉴,但艺术形式必须源于生活阅历,艺术底色更要坚守中国韵致。

在她的作品中既能看到西画对光影的捕捉——朦胧色调、柔和晕染,使画面充满诗意浪漫;也能看到对构图的突破——打破传统花鸟画程式布局,以更自由的形式展现物象灵动。但这些西方元素的融入,从未消解中



■ 故乡的路



■ 不一般的城市公园



■ 没有围墙的音乐殿堂——上海音乐学院

国画的本质。灵动的线条、氤氲的墨色、含蓄的意境,均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美学土壤,最终指向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情趣与生命哲思。

鲍莺的艺术拥有三种鲜明而独特的气质,它们相互交织,共同构筑起她的艺术美学。

其一,是微观视角下的生活关怀与人文情怀。鲍莺情感细腻,不热衷描绘名山大川的壮阔,也不刻意表现文人高士的隐逸,而是将目光投向生活细微之处,在一花一草、一物一景中挖掘诗意与哲思。她笔下的野花,虽无牡丹雍容、荷花清雅、梅花傲骨,却有着蓬勃的生命力,在郊野乡间肆意生长,绽放活泼与美丽。

在《不一般的城市公园》中,寻常的郊游野餐、路边小花、垫上的零食蔬果,被她以温柔笔触定格,勾勒出都市人心中精神栖息地。《希望》以微小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物象,传递对逝者的悼念与对美好生活的期许。以旗袍为主题的《海上花》系列,更是她的重要探索。她敏锐捕捉到旗袍与上海城市的深层联结:作为百年海派文化的缩影,旗袍见证了城市变迁,承载着东方女性的温婉优雅。鲍莺笔下的旗袍

不再是单纯的服饰,而是与花卉意象相融,将女性之美与自然之美结合。她精准把握衣物质感与线条弧度,将牡丹、绣球、鸢尾等花卉巧妙融入旗袍轮廓,让服饰柔美与花木灵动相映成趣,既展现东方女性的端庄妩媚,也是对城市精神与女性生命之美的双重礼赞。

其二,是对“工细绘画写意化”的技法探索与笔墨突破。鲍莺以工细绘画脱颖而出,却始终致力于打破工笔与写意的界限,探索融合之道。在她看来,工细绘画不应沦为无韵律的线条勾勒,更不该是照搬照片的刻板造型;依赖电脑构图、过度渲染饱和度的创作,早已背离中国画笔墨精神。为此,她格外注重用笔用墨的韵味,将写意的灵动洒脱融入工笔创作。

早年作品以清透朦胧见长,线条细腻、设色淡雅,如江南烟雨般温润;近年创作则更强调水墨表现力,以墨色浓淡干湿、虚实相生,营造淋漓写意质感。她对传统没骨法的运用尤为精妙,摒弃勾勒填色的刻板步骤,直接以色彩与墨色塑造形态,让笔墨与色彩在宣纸上自然交融,兼具工笔的精准与写意的气韵。色彩

上,她追求“沉郁恬淡”,用色不张扬、不浮躁,于淡雅中见层次,于沉静中显韵味,与笔墨相得益彰,共同营造出朦胧浪漫的意境。

其三,是以写生为基、去程式化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追求。中国画历来注重“师法自然”,但在长期发展中也形成了固定程式。鲍莺深知,程式是传统积淀,也可能成为创新枷锁。因此,她始终以写生为根基,走进自然、观察生活,从真实物象中汲取灵感。她笔下的花卉草木皆来自对自然的细致描摹,每一片花瓣、每一片叶脉都带着鲜活的生命气息。

全景式花卉作品《郊野公园》便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。此作与宋代全景花鸟有着本质区别:宋人追求局部精致、主次分明,呈现规整典雅之美;而鲍莺则撷取自然最真实的状态,画面中没有绝对主角,草木野花自由生长、肆意绽放,共同构成充满生命张力的画卷。这种创作打破了传统花鸟的程式束缚,也融入西方绘画对光影与构图的理解,却始终以中国传统美学“天人合一”为内核,展现自然万物的本真之美。

鲍莺的艺术与上海“兼容并包、海纳百川”的城市气质高度契合。她不排除西方艺术的优秀成果,却始终坚守中国画的文化底色;不固守传统笔墨的陈规旧矩,却始终传承东方美学的精神内核。其作品既有传统文人画的含蓄雅致,又有现代艺术的自由灵动。

近年来,鲍莺的艺术成就得到业内高度认可。作品频频亮相全国美展、全国画院展、上海美术大展等平台,屡获佳绩;在“日出东方”“海上风华”等上海重大美术创作工程中,她的创作也表现突出,广受好评。从《故乡的路》到《郊野公园》,再到《没有围墙的音乐殿堂——上海音乐学院》,她的创作从微观花草走向宏观城市精神,完成了从“见自我”到“见天地”的升华。她以女性艺术家的细腻与温柔,为传统中国画注入新的活力。

在当代艺术多元发展的今天,鲍莺用作品证明:中国画的创新,不必刻意标新立异,也无需盲目照搬西方,唯有扎根传统、立足生活,方能在守正创新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而她笔下的花草、旗袍与景致,也将如一首首隽永的现代诗,在岁月流转中,持续散发着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。

# 青花松竹梅纹梅瓶

◆ 聂难

在元代青花瓷器发展历程中,文人题材与制瓷工艺的交融,孕育出众多艺术珍品。1976年江西鄱阳县元墓出土的青花松竹梅纹梅瓶便是其中典范。该瓶高17厘米、口径5.7厘米、底径5.8厘米,摒弃元代青花常见的繁丽装饰,以清雅青花绘就“岁寒三友”,将文人画笔墨意趣融入瓷绘,是元代文人审美影响民间工艺的典型例证。

器型与工艺的精妙结合,构筑了此瓶的美学根基。它完美呈现元代梅瓶“口小颈短、肩部圆弧、身形秀雅”的特征:口沿内敛小巧,颈部挺拔短促,肩部圆润舒展,腹部修长流畅,底部厚重平稳,整体比例匀称。既具兼备酒、陈设的实用功能,又拥有典雅庄重的审美格调,修长腹部也为“岁寒三友”纹饰提供了创作空间。

青花工艺的娴熟运用,让文人意境得以精准呈现。元代青花本以浓艳的“苏麻离青”闻名,此瓶青料却呈现出淡雅的灰蓝色



■ 元代青花松竹梅纹梅瓶

调,宛若宣纸上的淡墨晕染。青料施色精准、晕散柔和,让纹饰自带朦胧诗意,与松竹梅的清雅气质高度契合,尽显元代工匠对工艺与题材适配性的深刻理解。

纹饰创作的文人化革新,是这件梅瓶最核心的艺术价值。腹

部“岁寒三友”图省去繁复辅纹,以纯粹植物题材分为三组,布局饱满且疏密有致,践行文人画“以少胜多”的追求。松树苍劲挺拔,以鱼鳞皴法细绘树干,松针细密灵动;竹干一笔勾勒、遒劲有力,竹叶叠压交错、生机盎然;梅花借鉴元代画家王冕的圈花法,细勾花瓣、浓青点蕊,枝干傲然,尽显傲雪凌霜之气。

这种技法打破了以往瓷器纹饰以民间题材为主的传统,让瓷器成为文人审美的新载体。松、竹、梅所象征的高洁品格,也寄寓着元代文人坚守本心、崇尚清雅的精神追求。

这件梅瓶更承载着重要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价值。元代文人审美在与民间工艺结合中获得新表达,其明确的出土与纪年信息,成为元代青花断代研究的重要实物依据,打破了元代青花“重器必华丽”的固有认知,丰富了学界对元代青花认识。

历经数百年,这件梅瓶依旧保存完好。它以瓷为媒,串联起元代文人的审美情怀与工匠的精湛技艺,成为跨越时空的艺术瑰宝,让今人感受元代瓷器艺术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。

# “鱼跃竹排”白玉笔架

◆ 姜连生

笔者藏有一件“鱼跃竹排”白玉笔架,长10厘米,宽2.5厘米,高3.6厘米。笔架雕一硕大鱼儿跃于竹排之上,以双鳍为支撑,鱼尾舒展,一侧贴于排面,另一侧微微倾斜向上、向左卷曲,恰好承笔;鱼头昂扬,宛如一幅鱼乘竹排、畅游河中的立体画卷。

笔架,又称笔搁、笔格、笔床,是中国传统文房用具,用以搁放未干的毛笔。其最早记载见于南北朝时期,南朝梁吴均《笔格赋》中已有“剪其片条,为此笔格”之句,距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。笔架材质多样,有瓷、木、紫砂、铜、铁、玉、象牙、水晶等。实用者以瓷、铜、铁、木最为常见,赏玩者则以玉笔架最具代表性,形制尤为丰富,其中又以山形玉笔架最为多见。

据文献与出土资料考证,玉质笔架始于哪个年代虽难精确定论,但从南宋周密《云烟过眼录》所记“古玉笔格”,以及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年间墓葬出土的青玉笔格可知,至少在宋代已有用玉制作的笔架。传世实物中,宋代玉笔架多作山形,峰柱低矮,峰顶平整,以实用为主;到了明代,玉笔架极



■ “鱼跃竹排”白玉笔架

为盛行,青玉、白玉皆有,多为山峰柱状,更重观赏性;清代玉笔架雕工较明代更为繁复精巧,工艺气息浓厚,除传统山形外,观赏性已远超实用性。

此件白玉笔架采用“竹与鱼”的设计组合较为少见,竹四季常青、挺拔坚韧,象征高洁、坚韧与长寿,更有“竹报平安”“节节高升”之寓意;鱼与“余”谐音,寓意富足丰收、年年有余。二者相融,竹之清幽与鱼之灵动相得益彰,暗含富足、和谐与吉祥之意。案头陈设此物,既实用搁笔,又能观赏把玩,实为文人雅士案头清供之佳品。